

中國書院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扮演什麼角色？

——專訪孔子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孔祥林

中新社濟南4月23日電 中國書院文化源遠流長。書院不僅是傳播文化、研發學術、培養賢者的重要陣地，也是文明碰撞交流的重要載體。歷史上，受中國影響，朝鮮、日本、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曾廣設書院，歐美地區也出現過書院。

發端於中國的書院，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變遷？何以在海外多國落地生根？當下，書院又如何繼續發揮文化和教育價值？孔子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孔祥林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暢談上述問題的見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書院源起何時，承載了哪些主要功能？

孔祥林：中國書院的名稱最早出現於唐代，但書院性教育始於孔子。春秋戰國時期，孔子首創私學，將教育推行到民間，把教育對象擴大到平民。其後百家爭鳴，書院性教育承擔著傳承文化、研發學術、傳播知識、保存歷史文獻的重任。

書院性教育不斷發展，但一直沒有通用名稱，直到唐代麗正書院的出現。麗正書院，又稱麗正修書院，是修書、藏書機構，其後的集賢書院在唐玄宗李隆基倡導下舉行詩酒唱和活動，被民間做倣後成為讀書人或官員的書齋，再由書齋發展成家弟子學習場所，作為私立教學機構的書院才真正形成。

北宋時期，書院一時勃興，出現泰山、應天府、岳麓等著名書院。到了南宋，因理學大興，朝廷提倡、官員支持、民間熱衷，書院進一步興盛。到元朝，部分書院被納入官學體系。

明朝是書院繁盛期，先後新建、復建書院2600餘所。到清代，書院達到鼎盛，並由官民共建逐漸轉向以民間為主。清末，伴隨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書院教育內容發生轉變，從獨習儒經轉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書院改制，千餘所書院改為現代教育的各級學堂。

回溯歷史，書院承載了文化傳播、學術研究與發展、人才培養、社會教化等功能。它有別於官學，面向平民辦學，為平民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機會，擴大了教育範圍。書院教授「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傳播



思想文化。宋代理學、明代心學、清代考據學的產生與發展，都與書院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中新社記者：中國書院如何走出國門，影響其他國家和地區？

孔祥林：書院雖然發端於中國，但它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教育機構，也被其他國家接受並倣效。朝鮮、日本以及東南亞地區的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都曾建設書院。書院的制度、教育內容、教學方式等深受中國書院影響。

中國書院以教育為主，主要學習儒家經典，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書院無不如此。宋代理學家朱熹為白鹿洞書院制定《白鹿洞書院揭示》，朝鮮、日本許多書院也將《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書院制度。中國書院有講書、會講、講會、考試、雅集等教學方式，也被朝鮮、日本書院廣泛採用。

在歐洲、美洲，書院亦有分佈。1732年，從中國歸國的傳教士馬國賢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建造歐洲唯一的書院——聖家書院，又名中國書院，早期專收中國留學生，後兼收有志到東方傳教的西方人和土耳其人。

美國舊金山於1888年建造美洲唯一的書院——大清書院，書院由華人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所建，招收華人子弟入學。

中新社記者：書院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孔祥林：書院是中國首創的一種教育機

構，它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受中國影響，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的書院教學內容以「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為主。西方教會書院則更側重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

現在談到東西方文化交流，普遍認為是西學東漸，其實東西方文化交流最早從東學西漸開始，而主力軍則是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

明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發現傳教非常困難，深受孔子思想影響的中國人根本不信什麼上帝。利瑪竇轉而學習儒家經典，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在歐洲出版，並撰寫《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向西方介紹中國思想文化，在歐洲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受利瑪竇影響，更多傳教士來到中國，將「四書」「五經」及詩歌等文學作品翻譯介紹到西方，同時著書介紹中國政治、哲學、思想、宗教、文化、經濟等各方面情況，在歐洲產生很大影響。

最先接觸中國文化的傳教士便採用中國書院的形式來培養在中國和漢語流行區傳教的人，例如1818年，傳教士在馬六甲創建英華書院，因書院教授英文、中文與馬來文，學生多從事翻譯工作，不願傳教。1843年，該書院遷至香港，現仍是香港名校之一。

此外，傳教士進入中國時，中國不准

其建造教堂。為擴大影響，教會祇能建造書院。教會書院首先從香港、澳門開始，而後徐徐進入內地，如英國聖公會在香港建造聖保羅書院。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教會書院開始向中國內地發展，到光緒末年，外國教會書院分佈更為廣泛。

許多西方教會書院深受中國書院影響，設置儒家經學，進行六韻詩、時文等學業寫作訓練，鼓勵學生參加科舉考試。書院在傳授宗教知識的同時，也傳授科學知識，設數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促進了中國現代教育的轉化和發展，推動了中西文明交流互鑒。

中新社記者：世界各地書院發展現狀如何？如何發掘書院的現代價值？

孔祥林：自19世紀末西式教育傳入後，不論在中國、朝鮮、日本還是東南亞諸國，許多書院都轉為西式教育，部分書院甚至被廢棄，留存到現在的書院並不多。

1984年，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張岱年、朱伯崑、湯一介等共同發起，聯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以及台灣、香港和海外數十位學者創建中國文化書院，宣告書院回歸。此後，大學、企業、個人紛紛創立書院。

目前，中國各高校流行設置書院，清華大學設新雅、致理、日新、未央等10餘所書院，北京大學開設鹿鳴書院。在台灣、香港、澳門地區，高校設書院也很常見，如台灣清華大學厚德書院、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等。2014年7月，復旦大學任重書院、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台灣清華大學厚德書院等書院選發起成立高校書院聯盟，現有52所高校、93個書院加盟。

企業設立書院多為培訓員工，用傳統思想文化提高員工道德水平，用科學技術提高員工工作能力。個人設立書院多側重面向社會培訓，傳播思想文化。

在國外，韓國目前是書院分佈最多的國家。其中，紹修書院等9所書院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部分書院開展普及傳統思想文化活動，但主要側重祭祀。

當下，社會各界充分意識到古代書院的價值，書院進入恢復發展的大好時期。書院應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發掘古代書院有效的教學方式、書院精神。

小螞蟻」怎樣「譯莎」？

——專訪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傅光明

中新社北京4月23日電 2025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亞461週年誕辰。「一千個讀者心中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莎士比亞戲劇之於讀者如此，之於譯者更如此。歷史上，眾多名家紛紛投身莎作中譯，「譯莎」之路可謂百花齊放。

近年來，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傅光明致力於《莎士比亞全集》的新譯，自稱「小螞蟻」的他用十數年時間形成了獨特的「傅譯莎」。傅光明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暢談「小螞蟻」怎樣「譯莎」，莎劇的時代價值如何。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為何獨譯《莎士比亞全集》？「傅譯莎」有何特點？

傅光明：在2012年短期赴美訪學前，我腦子裡從未冒出過這想法，可謂「天方夜譚」。

簡言之，美國作家韓秀女士（Teresa Buczacki）將我多年前譯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推薦給台灣商務印書館，我得以結識方鵬程總編輯，開始互通郵件。後來，方鵬程提出：「如果由台灣商務邀您重新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您會考慮嗎？」我不清楚方先生的膽量從何而來，但我對他始終充滿敬重和感謝。可以說，是韓秀和方鵬程共同使我與新譯莎劇結下不解之緣。

我認為，「傅譯莎」特點有三：語言、註釋、導讀。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這也體現在語

言隨時代而變上。

當然，翻譯不是兩種語言間簡單切換，更應譯出源語負載的文化，這決離不開註釋。看一眼英語世界的莎翁全集便明瞭，目前多個權威本，無一不帶有豐富的註釋。對於英語讀者，無註釋尚不足以懂莎，遑論母語為中文者。由此，我努力讓新譯本呈現集注特徵，每部新譯的註釋均達數百條之多。

此外，完成每部新譯後，我都寫一篇長導讀，其中寫《李爾王》的導讀最長，達到10萬字，篇幅超過莎劇戲文。我深切體會到，翻譯是最好的文本細讀。每篇導讀都努力多元呈現莎劇的「素材來源」，由此可見出莎士比亞如何編戲；並在分析劇情和人物的同時，將英語世界的最新莎研成果有所呈現。

到今年4月23日莎士比亞誕辰461週年紀念日為止，從2012年至今，歷時十三年個頭，「註釋+導讀」本的「傅譯莎」出版了29部，今年還將出2部。藉此，我向越來越多喜歡「傅譯莎」的年輕朋友致謝。

中新社記者：《莎士比亞全集》有諸多名家譯本為人稱道，有何缺憾？

傅光明：很多讀者可能沒注意到，所讀的「朱譯本」（朱生豪譯本），幾乎每部均經過後來不同譯者的修訂、校譯或改寫。換言之，讀過1947年上海世界書局版「朱譯本」的讀者，並不多。那麼，當我們以「朱譯本」為底本進行研究時，應以哪個底本為準？「梁譯本」（梁實秋譯本）因尚在版權

期內，且印本不多，讀者遠比「朱譯本」少，實在情理之中。

今天來看，「朱譯本」作為研究底本之一已顯出不足，除不少漏譯、錯譯之處，因幾無註釋，顯然難以再現源語中多元豐富的文化意涵，比如：將古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神的英雄「赫拉克勒斯」譯成「大力士」，將代指皮膚黑的「埃塞俄比亞人」譯成「黑金剛」。且莎作中與《聖經》和古希臘羅馬神話間的密切關聯，包括大量雙關語和各類詞彙、法律、射箭、軍事術語等用語，「朱譯本」幾近空白。而相較朱譯，梁譯雖添加了許多註釋，但因時代原因，註釋中極少呈現莎作與《聖經》間的互文性關聯。

正因此，閱讀、尤其是研究莎作，若僅以某一漢譯本為底，將英文註釋本棄之不用，實難以為據。這自是後來譯者所能享有的後天優勢。

中新社記者：「譯莎」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傅光明：由於非英語專業出身，我的「譯莎」之路，最大的困難莫過於英語非母語。有時，為查證、釐清一個註釋，要花很多時間。

好在隨時可向手頭多部英文註釋本、多部辭典及不嫌我煩的師友們討教。不過，我覺得這個過程很有趣，時常覺得自己每天在與莎翁玩文字遊戲。

「譯莎」本身，也是求知的過程。我深知，自己僅是一隻「小螞蟻」，幸運地掉在「巨無霸莎翁麵包」上。若拿胡適曾幾何時所說「譯莎」須英文出身、須留過洋這兩個

「必須」來評估，我完全沒有新譯的資格。托莎翁的福！

中新社記者：近些年來，關於莎士比亞作品的研究，有什麼新的發現？

傅光明：僅以我時常參照的「新劍橋」版莎翁全集為例，兩個特點最為顯著，一是註釋豐富；二是每部劇前皆有一篇由該劇資深研究學者所寫長篇導論。顯然，倘若中譯本及漢譯研究不能實時跟進，勢必滯後。英語世界的莎研，從政治、歷史、宗教、文化等多層面及文學藝術、舞台史、心理學等多維度展開。就個人而言，我的關注點在文學。我時常翻閱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莎研巨著《莎士比亞：人類的發明》，他對每部莎劇均作出個人化的卓越解讀，我從中受益良多。

中新社記者：莎士比亞戲劇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傅光明：一是成功在戲劇衝突。莎士比亞非科班出身，以至於寫戲之初，那些牛津、劍橋出身的「大學才子派」根本看不起他。莎士比亞演過戲，懂舞台，懂得商演最大的成功是票房收入，深知如何投觀眾所好，這也是莎劇到今天仍有市場的主因之一。

二是成功在語言盛宴。莎士比亞是天才的語言大師，能使用各種語言技巧。莎劇中的語言，是那麽詩意、浪漫、抒情、哀婉，且不失詼諧、逗趣，時常興味盎然。

以《亨利五世》為例，全劇幾乎成了亨利五世的專場語言盛宴，他的長篇獨白佔去相當篇幅。

龔少偉丁母憂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本會理事龔少偉先生令慈龔府李能德（Salvacion Lee-ong）老夫人不幸於2025年4月21日晚上十點不幸辭世，享壽90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chapel #302室，739 Gregorio Araneta Avenue, corner Agno Ext, Quezon City，擇訂於4月28日（星期一）上午七點出殯舉行火葬。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順變。

龔少偉丁母憂

菲律賓成衣紡織廠商會訊：本會顧問龔少偉先生令慈龔府李能德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十時仙逝，享壽

積閱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SANCTUARIUM 302室靈堂。擇訂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七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龔少偉丁母憂

菲華各校友會聯誼總會訊：本會理事龔少偉先生令慈龔府施能德太夫人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四月廿一日晚上十時逝世，享壽積閱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〇二室靈堂，擇訂於四月廿八日（星期一）上午七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勉其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訃告

許丁麗智

（晉江檀林村）

逝世於四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3-CAMELA）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翁林麗華

（晉江市龍湖鎮湖北村翁厝）

逝世於四月十九日
出殯於四月廿五日

龔李能德（Salvacion Lee-ong）

（石獅永寧西偏）

逝世於四月二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302號靈堂（Sanctuarium-302）
擇訂四月廿八日上午七時出殯

流芳百世